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出版工程重点图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普及读本

总主编：顾海良 余双好

吸引力 影响力 文化软实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沈壮海 佟斐 主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出版工程重点图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普及读本

总主编：顾海良 余双好

吸引力 影响力 文化软实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主 编 沈壮海 佟 斐

副主编 刘水静 王绍霞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吸引力 影响力 文化软实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沈壮海,佟斐主编.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普及读本/顾海良 余双好主编)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出版工程重点图书

ISBN 978-7-307-13521-5

I. 吸… II. ①沈… ②佟… III.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建设—学习参考资料 IV.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7009 号

责任编辑:柴 艺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whu.edu.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12.5 字数:174千字 插页:4

版次: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3521-5 定价:32.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
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序言

顾海良

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基本现状，我们编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普及读本”丛书，它是国家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出版工程重点图书。丛书分作十二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为主线，力图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这两个重要理论成果作出全面的探索和适合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阐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这一理论体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各个方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形成了一系列独创性的思想理论观点，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一理论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制度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道路是实现途径、制度是根本保障、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并随着实践而不断发展和完善。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

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力量的内核，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力和聚焦点，渗透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各个方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任务，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最为基本的也是最为重要的方面。

我们希望，丛书能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现。“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和阐释中，能凸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时代风格，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探索的理论精髓，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当代发展的新概括和新提炼。能在现实、理论与历史的结合上，在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上，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发挥意识形态引导功能的协同上，在中国的现实发展和中国梦的未来憧憬的联结上，彰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影响力和作用力，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理论自信 and 理论自强。

我们希望，丛书能从多方面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上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导向，对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民族

精神和时代精神力量及基本道德规范上发挥强大的推进力；在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和弘扬主旋律上，产生更大的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能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在积极引领社会思潮中发挥中坚作用，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在多变中定方向。

我们希望，丛书能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形象，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传播中国好声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能把握好“时、度、效”，努力讲真、讲实、讲好、讲活、讲深中国故事、中国情怀，进一步扩大中国道路、制度及其理论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感召力、影响力和认同力，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感染力。

丛书是由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老师合作撰写的，也是以余双好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普及计划的途径、载体和方法研究”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

2013年9月10日

文化软实力的中国话语、 中国境遇与中国道路

(代序)

沈壮海

近年来，如何提升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问题，日趋成为当代中国学界的“公共议题”。不同学科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学术聚焦，使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问题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社会性话题之一。然而，在当代中国，到底什么是文化软实力？与此相应，在当代中国，到底应当如何提升文化软实力？可以说，当下的研究热潮仍未将诸如此类的基本问题涤荡清晰^①。如何努力形成关于文化软实力的中国话语，并在此基础上，准确把握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所面临的“中国境遇”，从而有效探寻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中国道路”，仍是需要我们深入探索的重要课题。

一、文化软实力的“中国话语”

提升文化软实力，明确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发

^① 如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巧实力委员会”于2009年3月发表的《中国软实力和对美国的影响——在发展中世界的竞争与合作》认为：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激发了中国学者和普通大众的联想，引发了一场关于如何提高和运用中国软实力的辩论；尽管学术界对软实力的辩论十分激烈、领导层对软实力有浓厚的兴趣，但中国还没有形成一套综合的、连贯的国家软实力战略，一些已经出台的政策也前后矛盾；中国的软实力政策强调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临时采取的政策，主要是反应性的，旨在反驳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此外，什么是中国软实力的主要源泉？怎样增强软实力？怎样宣传软实力？怎样使用软实力？在这一系列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分歧。参见 http://csis.org/files/media/csis/pubs/090305_mcgiffert_chinesesoftwarepower_web.pdf。

展战略，是近几年的事情。2006年11月10日，在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上，胡锦涛基于对当今世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需求强劲提升、社会文化生活日趋多样活跃等文化发展新课题的分析，提出了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大课题。此后，在2007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进行第38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又从网络文化建设的角度论述了我国软实力的提升问题。在此基础上，同年10月，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明确运用“文化软实力”的概念，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为核心语汇，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可以认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即党的十七大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战略的总括。

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明确作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凝聚着我们党对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新特点的自觉体认，对文化发展在国家发展与民族振兴进程中地位和作用的深刻洞悉，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目标指向与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中国文化发展问题不断探索所取得的新的理论成果。

对于党的这一理论创新成果，我们需要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中进行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解读与理论构建。然而，我们在看到当代中国学界沿此方向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当下不少的研究，正陷入简单“跟着说”——简单紧跟约瑟夫·奈“软实力”之说的迷局。约瑟夫·奈这位“软实力”概念的明确提出者及“软实力”理论的系统阐发者曾于2004年在其《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中，以难以抑制的兴奋讲道，“软实力”这个概念提出后，“我很高兴地看到这一概念进入公共话语，被美国国务卿、英国外交大臣、政治领袖、社论作家和全世界的学者广泛使用”。^①当下不少以“跟着说”为特征的关于软实力及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将约

^① [美] 约瑟夫·奈著，吴晓辉、钱程译：《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中文版序言。

瑟夫·奈热捧为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领域几近家喻户晓的人物，无疑会强化约瑟夫·奈看到自己所提出的概念成为“街谈巷议”后的兴奋。

为何说以“跟着说”的思维对待约瑟夫·奈的软实力之论会陷入理论的迷局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为何提出，所指何物，意蕴何在。

约瑟夫·奈对“软实力”理论的系统阐发，集中呈现在他的以下著作中：《注定领导》（*Bound to Lead*, 1990）、《美国力量的悖论》（*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2001）和《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2004）。作者提出并阐发“软实力”理论的目的，是在不断变幻的世界格局中，更加牢固地确立美国的霸权地位，确保美国在当今世界能够“注定领导”。不论是《注定领导》中对盛极一时的“美国衰败论”的迎头痛击，还是《美国力量的悖论》中“提醒应当警惕发生‘胜利主义’这种与……‘衰落主义’相对立的错误”^①，抑或是《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中基于对伊拉克战争前、战争期间及战争后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分析而“对美国如何使用其处于绝对优势的力量的广泛焦虑”^②，无不紧扣美国如何“注定领导”这一主线。

那么，在约瑟夫·奈的理论中，“软实力”究竟所指何物呢？在不同的语境中，约瑟夫·奈对软实力有不同的解说。他将“软实力”概括为“影响力”，称“软实力是一种能够影响他人喜好的能力”^③；他也以“吸引力”解释“软实力”，称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

① [美] 约瑟夫·奈著，吴晓辉、钱程译：《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东方出版社 2005 年版，中文版序言。

② [美] 约瑟夫·奈著，吴晓辉、钱程译：《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东方出版社 2005 年版，中文版序言。

③ [美] 约瑟夫·奈著，吴晓辉、钱程译：《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东方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 页。

己所愿的能力”^①；他同时还明确地将“软实力”称为“同化力”（co-optive power）^②，“同化性力量是一种能力，根据这一能力，一个国家可创造出一种环境，使其他国家能模仿该国的方式来考虑自己的发展，确定自己的利益”^③，“当一个国家使得其他国家以其预期目标为目标时，这种权力就出现了”^④。约瑟夫·奈明确指出：“国际政治中，一个国家取得它所选择的结果可能是因为别的国家会以其为榜样，或者接受一种会导致这种结果的制度。从这一意义来讲，在国际政治中，规定导向、建立环境与使具体某国产生变革是同样重要的。力量的这一方面，即使人随我欲，可称为间接的或者同化式的实力表现。这与用主动命令的方式使他人随我的意志而行动的实力表现形成鲜明对比。同化式实力的获得靠的是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或者确立某种程度上能体现别国意愿的政治导向的能力。”^⑤可以看出，在约瑟夫·奈看来，软实力是国际关系领域中，一个国家对于其他国家所具有的以吸引为手段、以同化为目的的影响力。软实力的目的在于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使“人随我欲”^⑥，“达己所愿”^⑦。而“人随我欲”、“达己所愿”，既是“注定领导”的前提，也是“注定领导”的结果。

就理论实质而言，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可谓冷战

① [美] 约瑟夫·奈著，吴晓辉、钱程译：《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东方出版社 2005 年版，前言第 2 页。

② [美] 约瑟夫·S. 奈著，约瑟夫·S. 奈、门洪华编，门洪华译：《硬权力与软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6 页。

③ [美] 约瑟夫·奈著，何小东等译：《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军事译文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58～159 页。

④ [美] 约瑟夫·S. 奈著，约瑟夫·S. 奈、门洪华编，门洪华译：《硬权力与软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6～107 页。

⑤ [美] 约瑟夫·奈著，何小东等译：《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军事译文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5 页。

⑥ [美] 约瑟夫·奈著，何小东等译：《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军事译文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5 页。

⑦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ublic Affairs, 2004, Preface.

思维的产物。冷战在更多的意义上，即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价值之战。强调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价值领域的对抗，并极力谋求这一领域的“制人”之道，企图通过这一领域的突破而瓦解对方，等等，是冷战思维的重要体现。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与之前及大致同期的有关冷战理论，都无一例外地体现着这一特征。在其之前，当谈到与苏联的较量时，杜勒斯便明确阐述过“国家力量”的意义及其构成。他认为：“力量是和苏联领导机关交涉成功的关键。力量，自然不仅包括军事力量，也包括经济力量和其他无形的东西。”^①而“思想的力量”、“吸引力”正是力量所包括的“其他无形的东西”的重要内容。在杜勒斯眼里，冷战正是“一场争取人们的灵魂和头脑的斗争”^②，也正基于此，杜勒斯特别强调西方社会要实施“建设性和创造性”的计划，通过增强“吸引力”而赢得与苏联的较量。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无论就其理论的着眼点还是就其软实力的实施策略而言，都与杜勒斯的这些思想有相承之脉。

如果我们将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放在其同期产生的相关理论主张中进行比较，不难发现，其与有关通贯着冷战思维的理论主张也多有相合之趣。如与约瑟夫·奈《注定领导》几乎同时问世的《1999：不战而胜》，在这部通贯着冷战思维的著作中，尼克松逐一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所面对的“超级巨人”苏联、“解体的巨人”西欧、“难以驾驭的巨人”日本、“醒来的巨人”中国，提出了美国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但是，同约瑟夫·奈一样，尼克松没有陷入美国衰败论的论调，而是自信地大谈美国领导自由世界的责任，认为美国“有资源、有力量，也有继续充当世界领袖的能力。……能够成为21世纪一支永恒的力量”^③。关于

① [美] 杜勒斯：《战争或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20页。

② 转引自石斌：《杜勒斯与美国对苏战略（1952—195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

③ [美] 尼克松著，杨鲁军等译：《1999：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页。

对承担“美国使命”的“国家实力”的思考，尼克松将美国的理想概括为美国力量的来源^①，强调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美国“将不再能够以……先进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优势来领导世界；相反……将不得不以我们先进的政治观念方面的优势来领导世界”^②，理想的力量、价值观的范例将成为美国走向不战而胜的通途。在此，我们不能不惊叹约瑟夫·奈成书于1990年的《注定领导》与尼克松成书于1988年的《1999：不战而胜》之间的异曲同工。同样的立意主旨：一者要注定领导，一者要不战而胜；同样的关注重心：美国国力；同样的乐观与自信：美国无可匹敌；同样的国力新视角：一者名之为“软实力”，一者谓之为“美国理想”。

正是基于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约瑟夫·奈在自己的著作中引述一位历史学家的话：“不管军事力量和政治许诺为美国在冷战期间赢得在欧洲的成功奠定了多么重要的基础，是美国经济和文化的吸引力真正赢得了大部分年轻人的心智，使其拥护西方民主……当真正的消费兴起时，真正的社会主义很可能就要被淘汰出局了。”^③

对于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中的积极因素我们可以大胆地吸收借鉴，但是，如果陷入简单“跟着说”的迷局，则无疑容易掉入这一理论所具有的价值取向与思维框架之中，从而面对一系列的理论之困与实践之障。实际上，在这些方

① 尼克松有这样的论述：“我们的影响并不是来源于我们的军事或经济实力，而是来源于我们的理想以及这些理想在世界其他地方获得成功而形成的巨大魅力。在历史上，我们是唯一不依靠军队的力量而凭借理想的力量登上世界舞台的大国”；“我们的潜力似乎是无限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我们能够在全世界表现我们的军事力量，我们能够影响我们这个时代所有重大的政治事件。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理想以及我们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在国际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吸引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允许的话，世界各地数以亿计的人将移民到美国”。参见[美]尼克松著，杨鲁军等译：《1999：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

② [美]尼克松著，杨鲁军等译：《1999：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09页。

③ [美]约瑟夫·奈著，吴晓辉、钱程译：《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

面，我们已经开始不得不面对“跟着说”而带来的一些诘难^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形成具有强大话语权的文化软实力理论，或没有在软实力理论领域形成中国话语；世界已经熟悉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已经知道中国开始使用“软实力”的概念，但是还不知道我们所讲的“软实力”与约瑟夫·奈所讲的“软实力”在目标指向、功能定位与基本内涵等诸方面有何不同。因此，进一步深化文化软实力的理论探索，进一步明晰作为国家战略的文化软实力发展所坚持的基本内涵，形成关于文化软实力的中国话语，是当下的文化软实力研究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形成文化软实力的中国话语，基本的问题是“文化软实力是什么”。笔者认为，与约瑟夫·奈所讲的“软实力”不同，我们所讲的“文化软实力”不是国际关系领域的文化影响力、吸引力、同化力，与国际文化渗透不同。我们所讲的“文化软实力”，基本内涵即“文化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整体布局中文化建设将产生的现实结果，这一国力具体体现为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是否得到更好保障、社会的文化生活是否更加丰富多彩、人民的精神风貌是否更加昂扬向上，也体现为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是否树立良好形象从而产生相应的吸引力。文化国力的提升与经济实力的提升、政治文明建设的推进等一起，构成我们努力提升综合国力的基本战略举措。我们应在“文化国力”这一对“文化软实力”基本内涵解读的基础上，思考文化软实力提升所面临的“中国境遇”，探寻文化软实力提升的“中国道路”。

^① 如有人将我们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努力指责为进行文化渗透等。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巧实力委员会”于2009年3月发表的《中国软实力和对美国的影响——在发展中世界的竞争与合作》认为：中国不屈不挠地追求综合国力，但作为国际舞台的新兴力量，中国的战略意图不透明，这让全世界相当紧张。外界本来就担心中国把不断发展的实力投入硬实力，包括扩大军事实力和经济力量，现在外界又日益担心中国悄悄地加大软实力的影响。参见 http://csis.org/files/media/csis/pubs/090305_mcgiffert_chinesesoftware_web.pdf。

二、文化软实力的“中国境遇”

提升文化软实力，总是在具体的现实境遇之中展开的。离开对现实境遇的把握，我们无法深刻地把握文化发展的主题，无法有效地推进文化国力的提升。

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所面临的现实境遇，是当下文化发展所面对的一系列矛盾关系的综合展现。从整体上讲，中与外、古与今、一与多、大与小、强与弱等矛盾关系的交织及其客观展开，构成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所必须面对的现实境遇。

中与外。中国是世界中的中国，但是，近代的中国曾一度与世隔绝，正所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① 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开拓，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随着列强坚船利炮的袭来，中国在屈辱与抗争中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华民族逐步开始了更加自觉与富有勇气的直面开放、与时代同步、与世界交融的进程。以1978年为节点，当代中国以改革开放的战略抉择，从封闭转向开放，“走上了新的道路”^②。以1994年我国实现与互联网的全功能接入为节点，我国的对外开放嵌入了强大的技术驱动，开始踏上信息化的时代节拍，在新媒体的联结下成为更加开放的社会。以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节点，我国的对外开放纳入了强力的国际制度规约，将中与外的关系，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走向世界，直面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当代中国文化广纳博采、撷英咀华、创新发展的客观要求。然而，于中与外的对撞中如何维护文化的自性？如何在不同价值体系的较量中推进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发展？如何基于对文化安全的维护而维护国家的系统安全？……诸如此类的课题，也随着中与外关系的愈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页。

拉近而更加紧迫地置于世人的面前。

古与今。“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① 与此相应，任何文化系统的演进与发展，都无法斩断古与今的关系，都必须科学地应对传统和现代、继承和创新等基本课题。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同样要在今与古的接续、更化、超越中才能达至文明的新高度。然而，在古与今的关系上，迷恋与自弃并存、告别与泛滥同在，应是当下中国文化发展所面对客观状态的真实概括。或谓唯有传统文化才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材质，或谓唯有与传统揖别才可挣脱迈向现代化的羁绊；有强力清除，同时也有巨资重建；有“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②之欣慰，同样有“传统不传”之感叹。国外学者评论：“中国没有文化上的崛起。经济的崛起还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传统文化正在加速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中国越来越难以见到传统的痕迹了。尽管有人在提倡学习‘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经典，但这和整体社会的变迁又是多么不协调。没有人会相信这类努力能够真正维持传统文化，更不用说复兴了。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化传统的文明。”^③ 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古与今的关系尚待更加理性与有序。

一与多。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对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诸方面变化的描述连续使用四个“深刻”，以极强的冲击力勾画了我们所面对的“空前的社会变革”。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在其所著《北京共识》一文中，也以其独特的观察视角与生动笔触，对当下中国迅速发展变化的现实作过形象的描述。他惊叹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3～704页。

②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③ 转引自郑永年：《中国人应理性看待中国复兴》，《联合早报》2006年7月11日。

“求新”、“求变”、“创新”在中国的文章、吃饭聊天、政策辩论中像祷告一样反复出现，他甚至推测，可能中国人自己对中国的这种迅速发展的变化都感到迷惑不解，都不可能跟踪正在发生的飞速变化。变化的速度、深度、广度交织在一起，迅速地推进着当代中国的多样化进程，也将“一”与“多”的关系进一步凸显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必须面对的重要矛盾关系。多样并不可怕，多样是文化存在、发展、繁荣的本态；尊重多样性，即如马克思所讲的那样，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并不要求玫瑰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也是推进文化发展的本质要求；“和”确立于对“不同”肯认的基础之上，有着丰厚“和”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内在具有尊重多样性的文化性格。但是，实现“一”与“多”的和谐，同样是文化存在、发展、繁荣的本态；确立主导性，同样是推进文化发展的本质要求。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急速的多样化进程中，如何更加有力地确立和增强“一”的主导性，正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面临的严峻考验，也成为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必须应对的重大课题。

大与小。伴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当下国人的思想文化需求也以前所未有的强劲势头不断扩大。然而，与这种日趋扩大的思想文化需求相比，我们满足思想文化需求的能力还比较弱小。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7年度《中国文化产业报告》显示，2006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文化消费总量约为4685亿元。该研究认为，一个人均GDP达到1700美元以上的13亿人口的大国，文化消费总量不足5000亿元，显然不合理。如果人均GDP达到1600美元，文化消费在个人消费中应占20%，实际消费总量应为20100亿元，而2005年我国人均GDP就已经超过1700美元。据此，该报告认为，我国居民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尚不足1/4。2009年3月29日，温家宝在湖北武汉江通动画股份有限公司视察时强调要有我们自己的动漫产业：“我有时看我孙子喜欢看动画片，但是动不动就是奥特曼。他应该多看中国的动画片。……要让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要向世界展示中国

的软实力。让中国的孩子多看自己的历史和自己国家的动画片。”^①虽寥寥数语，却颇值得寻味。如何用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满足人们日益增强的思想文化需求，不断提升人们的思想文化生活品质，显然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必须关注的重要课题。

强与弱。我国也曾经是文化强国。20 世纪之初，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细考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自信地断言：“合世界史通观之，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②然而，梁氏也不无感慨地承认，中华学术进入“近世史时代，则相形之下，吾汗颜矣”。^③梁氏自陈其以如火如荼如海如潮之热情，期盼着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新生，“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④。迎着新中国成立的曙光，毛泽东曾这样阐述中国文化的复兴与发展：“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⑤新中国成立 65 年来，中华民族在走向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努力地推进着文化的创造与勃兴。然而，历史与现实的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使我们仍然不得不面对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全球的强劲横流。所谓在当今世界软实力竞争的

① 《温家宝考察动漫产业，称不希望孙子总看奥特曼》，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9-04/01/content_11111009.htm?

②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 页。

③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 页。

④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 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516 页。